

文明的傷害與轉折

● 曠新年

從一戰後巴黎和會中中國的被出賣到冷戰後科索沃危機中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從《辛丑條約》以後列強的中國瓜分圖到今天西方和李登輝的瓜分中國的方案，一個世紀的歷史似乎只不過是一個輪迴。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中國知識界的反應。美國的轟炸既是對於中國20年來政治經濟發展的一個考驗，同時也是對於中國20年來知識積累的一個考驗。對於中國駐南使館挨炸，中國知識界手足無措，主要的反應是幻滅。幻滅的情緒充分暴露了中國知識界難堪的知識貧困和思想空虛。為甚麼是幻滅，而不是覺醒呢？在幻滅與覺醒之間存在着難以逾越的鴻溝：幻滅是我們知識泡沫的破滅，是外力無情地撕碎了我們的自欺，而覺醒卻需要深沉的思想和知識上的準備。對於美國的暴行，從北京到全國各地中國人民表達了強烈的抗議，這樣一種自發的民間抗議是我們多少年來從沒有過的。然而，因為幻滅，我們的反應才具有這樣濃厚的感傷色彩和戲劇性。我們的抗議真實地表達了我們的憤怒，但即使較之80年前的五四運動，它也是蒼白和空虛的。五四愛國運動有新文化運動作基礎，儘管五四

新文化運動發展得遠不夠成熟，然而這一愛國運動畢竟有科學與民主的、個性與自由的新文化作為支持，因此，五四運動提出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有力口號。然而，今天我們所提出來的口號卻是這麼蒼白——「抵制美貨」。結果，當我們遊行完了，晚上回去一統計，卻發現我們的生活資源有90%來自美國，從價值構造到日常生活，從教科書到洗髮水，都是從美國批發來的。離開了美國，我們就無法生活。沒有美國，即使我們生活不致於崩潰，至少也意味着我們的生活水平突然跌落。「抵制美貨」是一個急中生智的口號，我們隨口喊了出來，卻沒有想到它是多麼自相矛盾。在某種意義上，「抵制美貨」就等於明明白白地走進死胡同。可見，簡單化的民族主義情緒實際上缺乏一種知識上的誠實性。我們的抗議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思想上的準備，缺乏基本的知識邏輯的支持，從而成為一種被羞辱以後單純的、過度的情緒反射。

對挨炸作回應，重要的不應在發泄我們受辱的情緒，而應該是對於我們的被支配性的清醒認識，以及一種真正對於被支配的克服的可能性的認識。我們對於挨炸所作出的強烈反

應，由於沒有知識的有效組織，因此它必然是混亂和不穩定的，也必然很快就會化為烏有，很快就會煙消雲散，不留一點痕迹。它難以真正成為歷史的記憶，難以真正積累為思想資源。

這些年來，西方的知識在不斷地對我們進行「說服」，這種說與被說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地征服和改造的過程。我們的知識、話語在不知不覺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程度恐怕是連我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這種變化的結果是使我們喪失了基本的立場，喪失了我們真實的知識，使我們迷失了自我，變成了對於西方的知識的簡單臣服。甚至連一些最激烈地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話語的人，實際上也已經被說服了，因為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反抗的資源已經完全是西方資源，完全是西方的概念和知識。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道不同不相為謀」，西方的Logos代替了東方的道，我們今天只能道西方之所道，言西方之所言。甚至我們很多人把改革開放簡單地理解為對於美國的模仿，理解為奴隸對於主人的模仿。然而，如果僅僅是奴隸般的模仿，如果沒有通過主體的改造，並且如果沒有經過一種認識上的斷裂，那麼我們就無法真正獲得認識和歷史的解放。我們過份樂觀地談論全球一體化——天下大同，而沒有認識到全球一體化是美國主導的跨國壟斷資本主義不可阻擋的擴張，是美國全球干預和支配的深化，這種干預和支配已經從政治、經濟的方面，逐步深入到對於日常生活的滲透和控制。在我看來，值得憂慮的反而是，今天在這種單極的全球化過程中以及面對這樣一種全面的支配，沒有產生一種抵制的力量。從80年代開始，我們知識界簡單地、毫無批判立

場地接受60年代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同時我們片面化地理解全球化，而不是歷史地、辯證地理解全球化的過程。我們把現代化和全球化完全中性化、抽象化、非歷史化了，我們只看到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而看不到東方殖民化的歷史。我們抽象地談論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把自由主義當成一個先驗的、普遍的東西，而不是把它作為一個歷史的、具體的東西來看，而且也從根本上忘記了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承認知識的有限性的經驗主義。我們應該從英國的歷史、知識和思想傳統中來看待和評價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而並不能把它當成一種先驗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推論。我們天真地談論「300年文明」，然而，離開殖民地和工人階級被奴役的歷史，就無法談論英國資產階級自由的歷史，離開殖民地和工人階級的被掠奪，就沒有英國資本主義的繁榮。實際上，甚至離開英美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具體歷史就無法談論貿易自由主義——自由貿易，這個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基礎和核心。我們從來沒有想要去看一看西方文明的另一面，好像這是與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無關的東西。斯諾(C. P. Snow)說：「大量英國財富來源於黑奴貿易——人類混亂骯髒的歷史中最為骯髒的一頁。父輩們的這些罪惡使我們的孩子們，也使別人的孩子們受到懲罰。」我們嚮往北美的繁榮，卻忽視它是以另一個美洲——印第安人的美洲的被摧毀和黑人的被奴役作為代價的。不僅如此，我們知識界還普遍地產生了這樣一種誤置：我們錯誤地把工人和農民當成了印第安人和黑人。

歷史是連續的，昨天的歷史還在今天繼續。西方的繁榮建立在東方的

貧困之上，第一世界的發達建立在第三世界的落後之上，今天發達的國家在昨天是宗主國，今天非發達國家在昨天是殖民地，我們怎樣可以把這種發達／不發達、殖民／被殖民的歷史分開呢？事實上，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過去的讚美，不僅是對於過去的歷史的美化，而且同時也是對於今天的現實的粉飾。同時我們也只有了解昨天的歷史，才能夠理解今天的現實。今天我們的世界觀有着嚴重的、甚至是根本上的缺陷。正如汪暉所說的那樣，比起五四的世界圖景來，我們今天的世界圖景是不完整的。在我們今天對於世界的觀察和理解中，只有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而沒有歐洲殖民主義的歷史。實際上，我們完全是用西方的知識來看待世界歷史和這個世界的現實的，也就是說，真實的歷史和真實的世界已經從我們的記憶和理解中被抹除了。從文學方面來說，我們今天的「世界文學」是由諾貝爾文學獎所頒布的文學秩序；與之不同的是，在五四時期，魯迅等人並沒有把英美文學置於他們文學理解的中心位置，他們的世界文學廣泛地包括了東歐、北歐等弱小民族的文學，他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弱小民族的主體地位，以及我們與這個世界發生聯繫的方式。今天我們的國際學術活動基本上是一種以西方為對象的「學術貿易」，具有濃厚的消費和買辦的色彩。然而，在五四時期，魯迅、周作人、茅盾等人對於世界文學的介紹中，是有着鮮明的主體意識的。在今天，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去關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的知識？因為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的生活體驗和知識，對於我們才是真正切己的和具有啟示意義的。

轟炸事件無疑是對於西方文明的一個嚴重的傷害，它是西方文明的一種自噬的行為。它說明了西方文明是多麼傲慢瘋狂，說明了東西方心理上的極端隔膜。美國人不知道《中國可以說「不」》只是個別嘩眾取寵之徒的商業炒作，那種「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行為藝術」，只是一種人間喜劇，它與中國思想界、知識界毫無關係。美國人不知道中國人是真正發自內心地熱愛美國文明。這是一種一廂情願的理想化的愛，用白樺的一個詞就是——苦戀。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對於中國的精英們來說，夢中的天堂、生活和精神的歸宿就是美國。對於我們來說，這是別無選擇的。如果說今天中國人還相信甚麼，還熱愛甚麼，甚至於還有甚麼「終極關懷」的話，那麼只有一個答案。也正是這樣，對於我們來說，美國的傷害才是真正致命的。這種瘋狂的愛受到挫折就會產生過度反應，就會轉變成幻滅和絕望。美國的轟炸把中國推到深淵邊上，使其處於一種極端痛苦、難堪的折磨之中。儘管我們對於美國高科技和「精確打擊」的無限崇拜和信賴使我們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但是我們寧願欺騙自己：這是「誤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至少從我們的心理、我們的立場和我們理想的知識邏輯來說，這確實是一次誤炸。

這是一次「錯誤的轟炸」，同時也是一次危險的轟炸。這一次轟炸炸毀了最基本的國際關係準則。它炸毀了秩序，炸毀了文明。我們毫無懷疑地使用西方的知識，運用西方的邏輯。我們對於全球化的樂觀態度，我們對於美國「知識經濟」話語的毫無批判的附和與起哄，我們對於人權概念的簡單的、片面的認同。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所謂「歷史的終結」，西方資本

主義已經成功地掩蓋了殖民主義的血腥歷史，已經成功地掩蓋了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深刻矛盾，已經成功地掩蓋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嚴重衝突，以致於我們把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發展歷史簡單地說成是「300年文明」。美國實用主義地對待人權／主權的遊戲規則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這些遊戲規則完全是由西方制訂的，可是長期以來已經被弱勢的東方認同和接受了，成為了一種普遍的規則和價值標準。這本來只不過是一套西方的遊戲規則，我們卻早已經把它當成了天經地義。美國和西方列強對南斯拉夫和中國使館的轟炸，實際上意味着西方在瘋狂地摧毀它自己文明的基礎。由於這一轟炸事件，恐怕對於那些即使無限信賴和崇拜美國的人來說，美國也已經變得古怪起來了，變得不可預測了，我們再也無法預知它可能會幹出甚麼事情來。這一次的轟炸完全摧毀了這個世界信任的基礎。然而，野蠻、頑劣的資本主義恰恰是靠一套信用制度——也就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形式的合理化來支持的。然而，在今天，這種外在的合理化也已經被美國和西方自己輕易地摧毀了。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是形式的合理化和實質上的非理性的奇妙結合。實際上，在現代，工具理性日益凌駕價值理性之上，工具理性支配着價值理性。然而，結果到今天，資本主義將工具理性這種外在形式的合理性也摧毀了。由帝國主義所支配的全球化的結果，在今天看來就是由於它失去了任何制約的力量，因此成為了超級大國的為所欲為，它撕去了沒有必要的文明偽裝，成為了赤裸裸的霸權主

義，不僅使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任何穩定感和安全感，而且使得文明本身已經徹底地醜惡化了。

物極必反。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的自噬，在這種野蠻的自噬中產生了蘇聯。在今天，這個世界已經喪失了一種必要的健康力量，它需要這樣一種健康的力量，因此也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健康的力量。今天，新文明的起點和曙光還在遠處，我們一時還難以看到。怎樣才能使世界變得合理一些，怎樣才能使脫繮的暴力找到一種制衡的力量，抵抗之力在哪裏發生生長，我們無法預知。曾經，共產主義是從西方文明內部產生的一種對於惡劣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力量，但是西方資產階級卻把共產主義妖魔化了，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一種邪惡的東西。我們不需要簡單的對於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馬克思主義也並不是從道德上來批判資本主義的，而且馬克思本人對於資本主義的肯定要多於批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實際上，共產主義與其說是資本主義的敵人，還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的拯救者。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批判者與反抗者，同時又正是它為資本主義提供了刺激與活力。今天當這種抵抗與控制之力消失以後，資本主義原始的、野蠻的本性又重新蘇醒了，馴服的資本主義又重新退化為惡劣的、野蠻的、醜陋的資本主義。我們今天的知識界還無力把轟炸事件的寓意義和預言意義闡發出來，然而，這一事件無疑會對中國未來文明的發展產生微妙的，同時也將是深遠的影響。

曠新年 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北京市文聯副研究員。